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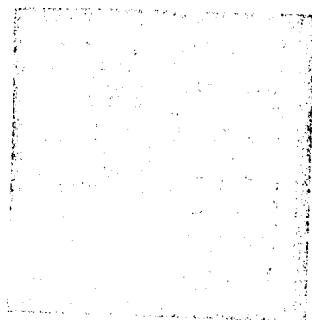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4 9673 6

G100/11

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论

姚润皋 林 源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9673 6

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论

姚润皋 林 源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0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13 千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5-03129-1/B·176

定价 11.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序

孙伯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富有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并产生了具有丰富内容和严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从而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理论飞跃。因此,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本书两位作者从哲学的高度,对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实质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本书突出地强调了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者较为忠实地叙述了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过程,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实事求是这一命题的多方面涵义,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得以产生的思想前提和逻辑起点,是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和精髓。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坚持、在实践

中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切入点。

第二,作者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实践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全面性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防止使邓小平理论片面化和凝固化的形而上学倾向。这是一个关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就理论而言,只有把科学理论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坚持真理的具体性、条件性和全面性,才能既克服窒息理论的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又避免否定理论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确保理论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中蓬勃地向前发展。而从实践方面来看,惟有做到全面、准确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的道路上,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使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永葆生机与活力。

第三,作者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贡献的同时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失误。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总结、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就和借鉴、纠正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基础上起步并发展起来的。这里,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今天,当我们处于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尤其需要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邓小平理论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又一丰硕果实。我国人民无比珍惜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宣传、研究、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历史责任。从长远的、战略的观点来看,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决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地反映着我们对历史规律的领悟和尊重。但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定要经受失败的挫折和艰苦磨练的。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走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路程。为此付出的代价使我们赢得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逐步认识,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必然王国逐渐地走向自由王国。我们之所以万分珍视邓小平理论,就是因为这一理论凝聚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心愿,集中了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事实表明,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坚定不移,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将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作者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充分肯定的评价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当然,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涵盖许多方面。本书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哲学的层面上,这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但仍有许多广阔的领域需要人们去探讨。在党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已经在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方面掀起了新的热潮。我期待着本书作者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对邓小平理论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精神产品,以推进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目 录

序	孙伯鍙
第一篇 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1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1
二、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	8
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13
四、实事求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胆识	25
五、实事求是：邓小平“结合”哲学的新篇章	32
第二篇 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	46
一、正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46
二、对邓小平理论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辩证思考	58
三、坚持认识的全面性——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研读	79
四、辩证法的全面性与新形势下的反倾向问题	94
第三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08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108
二、马克思主义论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121
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我们时代的主导价值观	135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性原则的对立统一	143
第四篇 毛泽东与邓小平：开拓、奠基与继承、发展	152
一、两代人的艰辛探索	152
二、从毛泽东的晚年走向邓小平的新时代	168
三、开放性：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182
四、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邓小平理论的深层意蕴	192
第五篇 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的锋芒所向及其巨大成果	204
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04
二、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216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5
四、在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236
五、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245
六、把实事求是化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251
后记	258

第一篇 邓小平理论的 逻辑起点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我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新的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较好地完成了毛泽东试图解决而最终却未能正确解决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任务,是我国和世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决非历史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种科学真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

了一个酝酿和萌发的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直接历史根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三十年间走过了一段极为曲折的道路,党和人民从切身经历中期盼全面纠正失误,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寻找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严格说来,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确立,使我们党所领导的实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便从过去以开展阶级斗争为基本形式的革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阶段,因此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科学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型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这是实践对理论的呼唤,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正孕育于新型的实践之中。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十分明确地重申:“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根据这一原则,毛泽东对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总结,并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从理论发展的渊源来看,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三十年以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直接先导。

但是,在1956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宝贵思想,由于指导方针的失误而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这种失误并不在于我们提出要自己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在于开辟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国情,使经济建设领域中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页。

被扩展到政治领域，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带有全局性、根本性错误的“左”倾指导思想。所以，果断而彻底地纠正“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便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是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间中国历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迫切课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这个历史前提中直接萌发的。当然，要圆满地解决历史提出的课题，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除了建国以后前三十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和曲折作为其酝酿、萌发的直接历史根据之外，它的形成和产生还需要一定的思想条件。这就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并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应当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人们提出了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的迫切任务，但要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反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人们要从这一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即取得正确的认识，却是一个客观向主观转化的认识过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不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那么总结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有可能事与愿违。因此，要确保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决不能囿于错误的指导思想来进行，必须首先端正指导思想，用正确的思想路线把人们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迅速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结束过去，包括拨乱反正、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等一系列内容；二是开辟未来，包括转移工作重点、改革僵化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突破传统偏见等。而无论上述哪一方面的工作，都需要以全

面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中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这里找到理论支点而产生、形成的。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牢固确立，我们党在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一方面从理论上正确地界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老祖宗不能丢”，即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则从实践上围绕着“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胆实践开拓，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产生，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必要思想前提，而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盛衰成败和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

自从列宁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便开始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范围内的现实社会主义曾出现过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然而，进入本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却由高潮走向低谷。由于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日益僵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导致社会主义实践相继在不同国家出现重大失误，并终于引发了本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纷纷丧失。伴随着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深沉的反思。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反思的过程既是一个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行自我扬弃和

自我完善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在社会主义自身矛盾的发展和冲突中、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再认识中,逐步地孕育、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又是当代世界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经济国际化的新一轮高潮,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催促着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必须更加自觉地顺应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的潮流,以便增强国力,推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冷战局面的结束,当代世界的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就为我们争得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国内建设,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要求我们党面对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为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必须采取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正确方针提供了可靠的客观根据。

第四,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持续不断,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是这一理论进一步充实、完善、丰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现实依据。

从思维抽象的角度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认识和实践之间交相作用的过程。起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大旗下,我们通过系统总结三十年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教训,在大的方面形成了诸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当时,由于新时期的实践才刚刚起步,所以这些方针政策主要地是基于对过去实践的回顾、总结而制定出来的。一旦将这些方针政策付诸实施时,实践本身便按其固有的逻辑在广阔的范围多方面地展开。其中有一

部分实践在不突破既定思路的前提下取得了成功，从而确证了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还有一部分实践由于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前迸发而把原有的思路进一步向前推进了，这部分实践尽管明显地带有极大的探索性和开创性，但只要其在实践结果上获得巨大成功，那么就会拓展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从而既有力地证明了原定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时也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如若这部分实践中的某些实践，其效果并不理想乃至失败，那么只要人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原因予以纠正或改进，也会从另一个侧面取得必要的正确认识。紧随着实践的不断拓展和深化，这一过程亦相应地向前推进，正确的认识将不断积累。当这些积累了的正确认识达到一定的数量时，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就会通过认识成果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反映出来。这时，关于某一事物或某一方面的正确认识就会成为一个有机的序列而系统化、理论化，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发生了。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关于某一事物或某一方面的系统化认识便逐步地扩展到更多的事物或更多的方面，从而涵盖了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于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但这并不是认识过程的终极。科学的理论还必须进一步回到实践中去，一方面继续指导实践、推进实践，以便进一步从新实践中取得新认识，另一方面则在继续实践过程中，进一步验证理论，检验新的认识成果，从而扩展、充实、完善、丰富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就是这样通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而逐步地发展和完备起来的吗？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顺应着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说，寻求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正确道路，是历史早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的成功和失误、时代主题的深刻转换

以及中国十多年来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全新实践,则为这一课题的解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答案。而邓小平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从而在我党历史上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实现了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概括的那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二、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

认真说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始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毛泽东逝世之后，党中央代表人民意愿，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从而使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由于晚年毛泽东长期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深重影响，当时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并没有敏锐而适时地抓住这一重大的历史契机，未能从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实现对晚年毛泽东所犯下的带有全局性质错误的超越。相反，他囿于晚年毛泽东业已成型的固有思维方式，在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这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两个凡是”毫无任何建树，它实质上是教条主义学风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其结果只能是堵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道路。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两个凡是”偏执于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使人们无法摆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历史阴影，难以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崭新局面。因此，深刻剖析“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彻底清除其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不良影响，便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首要的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凭借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毅然率先发起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1977年4月10日，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郑重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紧接着在1977年5月24日和7月21日的两次谈话中，邓小平反复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②

邓小平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著名论断，包含着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革命意义。第一，“两个凡是”离开了真理的具体性和条件性，混淆乃至抹杀了真理的适用范围，根据主观上的需要把毛泽东在彼时彼地的观点随意地套用到此时此地，从而使真理走向谬误；而邓小平的“完整准确”说则坚持对毛泽东的论断要作具体分析，指出不能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话移到另外的“问题”、“时间”、“地点”、“条件”下。^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如何正确地用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予以灵活运用的重大问题。第二，“两个凡是”把晚年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与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不仅掩盖而且进一步坚持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而邓小平的“完整准确”说则破除了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晚年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作明确的区分，因而从根本上捍卫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第3卷，第42页和第43页。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